



大会

正式记录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三六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4年7月13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洛希亚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

主席缺席,由副主席邦加利先生(塞拉利昂)主持会议。

下午3时10分开会

东帝汶问题(A/AC.109/1187)(续)

应主席邀请,乔纳森·比兰鲍姆先生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比兰鲍姆先生发言。

比兰鲍姆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是美国国会第18选区女众议员尼塔·洛威的代表。

人民选择自己政府的基本权利一向在美国人中间有着强烈的共鸣。自决原则扎根于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并被列入《联合国宪章》。它同非殖民化一道,构成了全世界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显然,东帝汶人民从未享受这项权利,他们从未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官员或决定自己的未来。他们在1975年摆脱了葡萄牙的殖民枷锁,但却在不到一年之后被强加了印度尼西亚的枷锁。目前无数的违反人权现象加深了我们必然对他们的状况所感到的愤慨。

作为联合国成员和世界领导,美国必须帮助实施《联合国宪章》。作为一个民主体制,我们必须特别关心其自决条款。在发挥这两个作用时,我们必须对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存在采取坚定和连贯的立场。

过去,美国选择了一种平衡术,我们权衡了经济和军事目标与人道主义目标,认为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合作将促使

它扩大人权。自1975年以来的各届政府都采取这一方法,但是这失败了。根据包括大赦国际和亚洲观察在内的国际人权团体的报告,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认真调查有关人权的指控或采取行动遵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3年建议。

联合国现在必须采取更坚定的立场。不仅不要让我们对同印度尼西亚作对的可能的后果感到泄气,反而应当回顾我们对南非的镇压采取的成功立场。由于我们坚决地坚持对人权的保障,使我们看到了政府的转换以及人民重新获得其权利。

正如人权委员会过去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继续敦促印度尼西亚向调查人员和记者打开东帝汶的大门。他们的报道是很宝贵的,向世界其他地区指出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弱点以及在国内缺乏支持。

印度尼西亚显然关心其公众形象,一位法官在1992年判处费尔南多·阿拉乌约9年徒刑,因为他“在国际社会的眼中侮辱了国家”。我们必须向印度尼西亚表明,消除令人难堪的批评的方法不是压制批评,而是改变对被告和囚犯的待遇。

报道本身是不够的,尽管它们有助于唤起国际上的支持。我们也必须愿意努力确保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使他们不仅了解其错误,而且也努力纠正其错误。他们必须承认帝汶人民的权利,我们必须迫使他们这样做。正如美国国务院拨款委员会所敦促的那样,我们必须以实力来支持我们的言论,例如,直到他们遵守之前完全停止武器销售。

正如东帝汶独立运动被监禁的领导人萨纳纳·古斯毛所说：“所谓的印度尼西亚临时政府是建立在被屠杀的帝汶人的尸体之上的”。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作相反的声称，它并未采取过合法的帝汶自决行动。“文化差异”也不能掩盖政府的侵权行为。不经过合法的审判而拘押囚犯以及政府合谋参与谋杀，不管发生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犯罪。

我们必须强化我们的立场。必须迫使印度尼西亚承认帝汶人的人权及其自己公民的人权是不能谈判的。

只有在东帝汶人之间举行一次全民表决，才能合法地决定他们的地位。在点清这些人民的选票，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前，国际社会及其自决的原则就不能得到满足。

我呼吁本委员会、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认识到印度尼西亚公然践踏行为对世界人权带来的明显的危险。我们站起来捍卫东帝汶人的权利，就是捍卫所有自由人民的权利。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查尔斯·H·诺奇先生（国际人权联盟）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诺奇先生发言。

诺奇先生（国际人权联盟）（以英语发言）：我要代表国际人权联盟，一个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享有协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感谢各位让我今天能在本委员会上发言。本委员会定期处理的非殖民化和自决问题，是本国际联盟长期关注的问题。自从本组织1941年成立以来，我们已向来自30多个国家主张独立的人们提供协助，这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成为联合国会员。事实上，在这方面本联盟最自豪的成就之一就是协助印度尼西亚缔造者之一——穆罕默德·哈塔先生，他为本国摆脱荷兰殖民统治赢得独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因此，我们感到具有讽刺意义而且又是痛心的是，我们发现有必要再次来到本委员会面前，抗议印度尼西亚剥夺东帝汶自决和平等的权利，这些正是印度尼西亚近50年前正当地追求的权利。

自从1975年印度尼西亚入侵和所谓合并以来，国际人权联盟一直在积极关注东帝汶的局势。我们第一次在第四委员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是1978年，随后我们又多次来到联合国，在大会上谈这一问题，直至1982年，其后，我们在本委员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都强调印度尼西亚的行动的非法性，这些行动如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解释《宪章》关于使用武力和自决的司法原则的大会有关决议。

特别是本联盟经常表示，印度尼西亚有关东帝汶“合并”的说法不符合大会第1541(XV)号决议第九项原则的要求。这是一项本委员会非常熟悉的原则，它涉及非自治领土可以自愿并入另一个国家的方式。印度尼西亚“合并”的方式在许多方面不能满足第九项原则：印度尼西亚为实现合并而炮制的“东帝汶地区人民大会”，并不是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组成的，合并问题也没有经过认真的辩论，也没有向这一大会提出其他的选择。然而，比“区域人民大会”的组成无代表性或其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军事入侵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真正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一个在遭受大规模入侵前只享有两个星期的独立的领土，已经取得了第九项原则所要求的“高度自治程度”。联合国清楚地理解，“区域人民大会不是选择合并的可接受的渠道，因而正确地拒绝观察其工作情况，以免给它带来合法性”。

但是，今天下午没有必要讨论这些和其他一些法律理由。不仅本联盟人员已经多次阐述这些理由，而且这些理由是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很熟悉的。正如本委员会最清楚不过的知道，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已对印度尼西亚使用武力表示痛惜，并要求让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大会已经拒绝东帝汶已经合并纳入印度尼西亚的说法，因为该领土的人民还未能充分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印度尼西亚政府有关它如何实际让东帝汶自决的说词，已经遭到明智和明确的拒绝。

今天我们在此重复这些事实，不是为了提出有关印度尼西亚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新论点，而只是提请委员会记住那些已经被决定的事实。在我们讨论东帝汶的人权状况时，国际人权联盟请本委员会不要忘记这一局势的背景状况，那就是对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自决的民族占领，而联合国认为，这一占领是非法的。

根据外国记者、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报告，在东帝汶境内，基本人权继续遭受广泛践踏，其他请愿者也已经证实和将在今天证实这一点。中心问题是大量军队的存在所造成的一种恐惧的气氛，以及被怀疑具有支持独立思想的个人的待遇，那怕这些思想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给委员会举个最近的例子，三名东帝汶人——伊萨克·索雷斯、米格尔·德杜埃斯和潘塔莱奥·阿马拉尔——上月份被判处20月徒刑，因为他们在4月份对外国记者喊支持独立的口号。据说这些

被拘留的东帝汶人受过审判,但从许多在东帝汶被审判的独立积极分子一样在审讯或审判期间,他们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律师代表。

联合国本身也继续注意到该岛上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1994年初,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未经法律程序、立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和强制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都提出报告其中有涉及东帝汶的章节。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他1994年的报告中列入了若干在东帝汶对政治犯实行酷刑的事例,证据确凿,他已在1993年,把这些情况递交给印度尼西亚政府。

不按法律程序、立即或任意自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报告中写到

“东帝汶继续受到印度尼西亚治安部队践踏生命权利的行为的特别影响”(E/CN.4/1994/7,第343段)

而且他对“践踏人权者继续逍遥法外”表示关切。(同上)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对费尔南多·德阿劳霍案例作了评估。费尔南多·德阿劳霍是在巴利被捕的一名东帝汶人,因抗议1991年11月12日东帝汶部队在帝力的圣克鲁斯坟场屠杀和平示威者,被判处9年徒刑。该工作组决定,他的被捕和继续拘留是任意的,他的审判达不到国际公正的标准,而且有实据说明,他在拘留期间可能遭受酷刑。

1993年期间,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按照其紧急行动程序,向印度尼西亚政府转递了17份失踪人士的新案例,据报道,这些人曾在帝力被捕但没有逮捕证,并且被单独监禁。印度尼西亚政府在答复中称这些案例是伪造的,但却无法提供其中任何一个人现在何处的情报。

印度尼西亚可以说,这些报告员和工作组收到了假报告。但是,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想进一步评估情报,他可以邀请这些工作组和报告员前往东帝汶,亲自评估那里的局势,这正是人权委员会促请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的行动。

在我们检查问题的这些枝叶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根源:那就是,非殖民化从来没有扩展到东帝汶。该民族从葡萄牙统治直接走进印度尼西亚统治,从来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东帝汶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不是孤立的暴力事件,而是反映了一种更加有计划的作法。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没有5 000多名印度尼西亚军队和军事特工人员占领该领土,就不会有保安部队在东帝汶侵犯人权的行为了。如果不设军队压

制当地人民的独立愿望,那么就不会有军队占领东帝汶。如果允许当地人民行使最基本的权利,即自决权,那么他们就不会发出要求独立的呼声。

东帝汶在此证明,自决这项国际法原则的广泛重要性。如果这项权利被剥夺、忽视或遗忘,那么所付的代价就是给人们造成痛苦。东帝汶的情况就是如此,该民族的所有人权都遭到侵害,因为这个非自治领土的一项基本权利,即选择自己法律地位的权利仍未得到实现。

这个问题有一些紧迫性。去年7月,国际人权联盟提请本机构注意一种作法。如果听任他继续下去,那就会使东帝汶人永远无法自由选择他们的地位。我指的是印度尼西亚采取的“移居”政策,即将人口从群岛中人口密集的地区转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的重新定居政策。不论这项政策对印度尼西亚本土有什么好处,他适用于东帝汶却带有非常不祥的征兆。1993年5月的《观察家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估计,帝力的一半人口都是在东帝汶以外出生,现在总人口大约三分之一是移民。澳大利亚《时代》日报的一位记者爱德华·西伯顿在2月份走访了东帝汶,他得到报告说,每星期都有两艘载着爪哇定居者的船只到达帝力。他们都得到早于实际日期的身份证,以便他们能在就东帝汶的未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投票。

正如我们去年指出的那样,将印度尼西亚人重新安置到东帝汶至少违背了两项重要的国际文书,即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49条--印度尼西亚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和大会第35/118号决议。其中载有“关于全面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行动计划”。这两项文书都包含相当明确的法律义务。《日内瓦公约》禁止占领国

“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移送到“其所占领土。”(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9条)

第35/118号决议也反对同样行动,尤其是在以下情况,即他们

“可能严重妨害各该领土的人民真正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第35/118号决议,附件,第8段)

最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知道,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任何决议本身都不会给东帝汶带来非殖民化和自决。我们都知道,联合国往往无法实施他自己的决定,无论这些决定多么公平和公正。但问题是,联合国及其各机构仍然可以

作出这些决定，仍然可以声明并推动合法和公正的东西。重要的是东帝汶人应该继续争取实现自决，本委员会可以在帮助他们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实现其合理要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康斯坦西奥·平托先生(毛比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在请愿者议席就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康斯坦西奥·平托先生发言。

平托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叫康斯坦西奥·平托，我是毛比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驻联合国的代表。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所属的组织。毛比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是为自决和独立而斗争的东帝汶民族主义者的主要组织。该组织于1988年由抵抗运动领袖桑那那·古斯矛创建，他是联合东帝汶各正当力量和在东帝汶及印度尼西亚开展活动的所有东帝汶地下政治抵抗团体的一个非党派机构。

这样，毛比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已成为包括东帝汶民族主义所有派别的一个组织。他是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和被占地区以及海外的外交阵线表达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工具。

在东帝汶境内领导毛比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是由四人组成的武装抵抗执行委员会和由五人组成的秘密阵线执行委员会。领导武装抵抗是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其主要领导人是宁诺·科尼斯·桑塔那，他还是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革阵)的首脑。秘密阵线由萨拉巴先生领导。

毛比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意识到我国所在的地理位置，他认为应该与亚洲和南太平洋的所有邻国建立密切和睦的关系。独立的东帝汶共和国将争取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南太平洋论坛。鉴于葡萄牙通过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东帝汶的自决而表现出的崇高道义立场，我们还将保持与他的密切关系。

东帝汶汇聚了三大文化和宗教：美拉尼西亚文化，他将东帝汶人民与南太平洋联系在一起；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因为许多东帝汶人可追根溯源到东南亚；以及欧洲文化，这是葡萄牙天主教在那里存在达四个世纪的结果。这些影响使东帝汶民族国家具有独特的特征。在东盟和南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国与欧洲联盟、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中，东帝汶可以成为他们的重要伙伴。逃离东帝汶的大多数人都定居在澳大利亚和葡萄牙。他们可以促进东帝汶起作为他们移居的国家和南

太平洋国家之间的桥梁的作用。

毛比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设想建立一个没有正规军的独立的东帝汶共和国。外部安全将依赖中立条约，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提供保证。东帝汶将与其邻国和联合国一道努力，以宣布该国周围海域为和平区，并努力实现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区域的非军事化。毛比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希望根据人民通过自由民主选举所表达的愿望，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坚强的民主国家。我们将鼓励建立一个与司法机构一样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介。我们坚信人权超越国界，并位于国家主权之上，并具有普遍性，一个独立的东帝汶将促进加强人权。我们还将积极支持设立一个国际法庭和刑事法庭，审判违反人类罪。所有人权条约都将提交东帝汶议会批准。

免费教育和医疗对于人民的福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大量进行投资。不需要维持正规军而节省的资金可以很好利用在这些方面。一个健康、正常和幸福的社会不能够建立在仇恨和报复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将宣布大赦和民族和解，以宽恕现在的敌人。

由于其在过去二十年中的信誉和声望，东帝汶教会可望在愈合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重新安置成千上万在过去二十年中流离失所的人以及赔偿丧失的财产等问题需要得到处理。另外，十多万印度尼西亚人已在东帝汶定居，他们当中许多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那些愿意遵守东帝汶法律并且作为社会成员和睦生活的人将受欢迎留下来并参加为每一个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努力。他们丰富的文化可丰富东帝汶的未来。

东帝汶可能在大部分农产品、肉和鱼类方面自足。独立后，经济资源将用来为人口生产粮食。政府的政策将是同每一个地区、城镇和村庄的人民进行密切协商的结果。将寻求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合作，以执行一项重新造林计划来挽救遭到严重破坏的环境。将寻求勘探诸如石油等地下自然资源中的国际伙伴关系。然而，绝不能为了短期收获而牺牲环境。将审查《帝汶峡谷条约》，予以澄清，并对该条约重新进行谈判。海岸线争端将必须通过国际法庭予以解决。

根据联合国已加强的和平作用，全国委员会已提出一项计划，以协助秘书长履行其寻求东帝汶冲突的解决的使命。这项计划同东帝汶天主教会领导人贝罗主教发表的声明是

一致的,并且同目前联合国和葡萄牙的解决办法是一致的,这项计划还得到美国国会、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朋友们也能够看到这项计划作为一个协助雅加达方便地把自己从东帝汶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潜在手段的价值。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详细阐述全国委员会的和平计划。

第一阶段将包括:举行由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东帝汶人参加的印度尼西亚—葡萄牙会谈,以实现结束东帝汶的武装活动;释放政治犯;减少印度尼西亚军事人员;撤走武器;扩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减少印度尼西亚公务员;人口普查;各联合国专门机构进入东帝汶以便恢复和保护环境、重新安置、地区发展、妇女和儿童保健和公共卫生以及免疫;恢复所有人权;取消对葡萄牙语和德顿语的限制;设立一个独立的人权委员会;在东帝汶设立一个联合国总部。

第二阶段持续五年,将实现自治,自治的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东帝汶人将通过自己的地方机构民主地自己管理自己。这将要求在联合国的监督和协助下举行民主选举产生一个地方议会,任期五年。只有东帝汶人可投票和被选举。这一阶段将涉及:由议会选举一位任期五年的东帝汶总督,议会的权力包括就国际贸易关系、投资、财产、移民和其它事项立法;撤走所有印度尼西亚军队和进一步减少印度尼西亚公务员人数;由联合国组织的属地警察部队置于总督指挥下。该领土将不拥有军队。第二阶段可在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人民之间相互同意下延长,东帝汶人民可通过公民投票表达其意见。

第三阶段—自决—涉及为举行自决公民投票作准备,公民投票将在这一阶段开始的一年内举行,在公民投票中,人民可在自由联系与印度尼西亚合并或独立之间作出选择。

现在,我要提供关于东帝汶目前局势的资料。

1994年6月16日武装阵线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尼奥·科尼斯·桑塔纳提出的一份报告表明,印度尼西亚治安部队成员继续粗暴地、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尼尼奥·科尼斯·桑塔纳的报告提到1994年5月6日在马乌·卡特村以西大约3公里的丁劳地点发生的一起事件,该报告说:

“一个名叫马塞洛的男孩是毛·布蒂和西·毛的儿子,他被一名印度尼西亚巡逻兵杀死。

“马塞洛和他的三个兄弟在当地军事当局的准许下去猎食。他们的狗发现一只鹿,狗开始追这条鹿,并在捕捉到鹿之后杀死了它。这几个男孩生了一堆火烧

鹿肉吃,当烟从火上升起的时候,引起了来自在该地区活动的第745或717营的一个排的注意。士兵们向冒烟的方向走去,并包围了四个男孩,他们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尽管知道这一点,排长仍命令士兵们开火,打光M-16自动步枪弹盒内的所有子弹,好象他们正在公开战斗中向武装的游击队员开火。马塞洛肚子中弹,不能动弹,其它三个兄弟却逃走了。马塞洛大声叫喊,说明自己的身份,但士兵们继续开枪,排长接着命令扔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马塞洛。好象这一切还不够,排长把马塞洛的尸体靠在一颗树上并要他的士兵们看他的枪法多准以及他们应当如何射击破坏治安份子及其支持者,接着把另一梭子弹射进这个男孩的尸体。马塞洛的心脏从背后迸出。在犯下这桩野蛮的罪行后,他们把尸体扔进河里,并用石头砸碎他的脑壳。”

马塞洛的案件不是孤立的。6月10日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6个犯人从帝力转移到爪哇的三宝垄监狱。这6名犯人是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布兰科、哈辛托·阿尔韦斯、菲洛梅诺·佩雷拉、胡文西奥·马丁斯、格雷戈里奥·萨尔丹哈和萨图尼诺·达科斯塔。

其它案件包括一个名叫何塞·曼努埃尔·达西尔瓦·梅尔内斯的男孩案件,他于1992年被捕,现在正遭到维科科部队的关押,并且不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他的亲属探望他。奥拉西奥·达科斯塔于1992年8月在萨姆被捕,现被军队关押在贝塔诺。

东帝汶局势的特点是,军事侵略升级和政治镇压加强。印度尼西亚外长阿里·阿塔拉斯于1993年9月17日在纽约和1994年5月6日在日内瓦会谈中向人权委员会和秘书长所作的庄严保证有系统地遭到违反。酷刑做法司空见惯。

我们希望印度尼西亚当局将允许目前正在东帝汶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恩迪亚耶先生调查所有这些暴行,特别调查在《一个民主的死亡》这部电影中所显示的1991年11月12日大屠杀事件和在帝力军事医院发生的大屠杀事件。

最后,我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坚定不移地处理东帝汶问题并寻求一种基于我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当我们与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外长会晤时,将已经在东帝汶人权局势和有关该问题政治方面的讨论中取得实际进展。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莫林·托尔弗里夫人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托尔弗里夫人发言。

托尔弗里夫人(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让我在本届会议上提出请愿。

我叫莫林·托尔弗里，来自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我是1975年10月16日在东帝汶巴利博被危害的五名记者之一布赖恩·比得斯的姐姐。布赖恩比我小四岁，是我三个兄弟中的最年长者。他作为澳大利亚悉尼的九频道电视台的摄影记者而奉命前往巴利博。

这一切都与我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因为我不仅是他的姐姐，而且几乎是他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在我15岁时离开了家，所以就要由我同我父亲一道养育我的弟弟们。

我弟弟在试图帮助东帝汶人民的时候被恐怖地杀害。我之所以到这里来向你们发言，是因为我知道他也会要求本委员会尽一切可能来使东帝汶人民能够得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委员会成员将从我的话中理解我为什么以前从未到这里发言。

布赖恩在18岁的时候移民到澳大利亚。1975年9月，他写信告诉我们：他在一个叫东帝汶的地方渡过了难以致信的一周。尽管在独立东帝汶革命阵线与帝汶民主联盟之间有一些战斗，但他和他的九频道新闻主任杰拉尔德·斯通发现革阵控制着帝力的大部分地区。他在离开时帮助一个1400民盟难民的团体前往达尔文。他还带着革阵当时主席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多阿马拉尔对“兄弟的澳大利亚人民”发出的请求帮助的呼吁。阿马拉尔谈到其人民获得“完全和彻底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请求澳大利亚人民“帮助帝汶人民以避免任何外国干预”。

由于布赖恩在第一次任务中干的很好，九频道要求他前往东帝汶完成第二次任务。这就是他前往巴利博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布赖恩出事的时候，是他的前女友于10月18日打电话告诉我：他和另外4名记者到那里去了，而有4具尸体被发现。她告诉我第5个人没有找到，于是我们希望并祈祷这可能是布赖恩，他或许藏起来了。

到了星期一，即10月20日，杰拉尔德·斯通从澳大利亚给我打电话说，五名记者都被杀害。他说我们将收到一封电报，我们确实收到了。似乎有很多令人不解之处，但我们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后来我感到需要作点什么，于是我于1975年11月20日前往澳大利亚去整理布赖恩的遗物。那是令人极

为伤心的。

我到达澳大利亚不久，就接到外交部长安德鲁·皮科克——或许是他部门的一位官员——的电话，说他对我兄弟的死感到如何难过，但“我对此事没有什么可说或可做的，以给予任何帮助”。

在我从澳大利亚返回时，匡塔斯航空公司的员工正举行罢工，我只得剩包机前往雅加达，然后从那里剩泛美航班飞往英格兰。有人告诉我，我弟弟的遗体会送往雅加达，于是我想我应争取在雅加达停一下，并告诉航空小姐给予安排。她为我作了安排，而当我到达时四名士兵上来把我从飞机上带走。我猜他们是士兵——他们穿着军装，枪套中有枪。他们没有对我讲话，但却送我穿过停机坪来到一个房间，我在那里被看着过了15分钟。

然后电话铃响了，卫兵示意我拿起听筒。我猜是英国或澳大利亚领事管的什么人——打来的告诉我他们不能保障我的安全，我最好回到班机上。他们还告诉我，我弟弟的遗体并未处理完，那不是真实情况，因为遗体显然已于12月12日处理完，而我相信当时已是12月26日。

回到布里斯托尔，我收到我的议会议员托尼·本的二封信。第二封信谈到五名失踪记者的个人物品及四具装有四名记者的遗体的箱子。信中说，

“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医生证实，无法肯定遗体的身份。”

他还说，

“当局交还了文件及一架据说在其遗体已被焚烧的第五名欧洲人身旁找到的照相机”。

后来，我读到《新闻周刊》1975年11月10日的一篇报导，它指出其中一名记者，

“马尔科姆·伦尼在战斗前不久报导：他有印度尼西亚军舰和直升飞机参加对帝汶的战斗的影片……

‘印度尼西亚部队正越过边境，这不是什么秘密’坎培拉的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星期指出。‘他们最不愿看到的是一个外国电视摄影组当场抓到他们。’”

《新闻周刊》的报导附有三张照片说明。一张是摄影小组人员所使用的建筑物，墙上用很大的字母写着“澳大利亚”。2张布赖恩和马尔科姆的较小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是：“严重嫌疑有人搅鬼”

除澳大利亚官员的声明以及有关据称对五人死亡进行

的调查-调查指出他们死于迫击炮的炮火之外,我没有听到其它报导。

我有一些剪报但我每次看它们时都很伤心,我父亲也是如此。我不愿冒使他伤心的危险。他在布赖恩逝世到他自己于1990年逝世之间有三次心脏病发作,所以我把东西放起来以图最终作点事情。

于是在几个月前,我在一个无线电节目上听到在英国工作的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约翰·皮尔格将谈到东帝汶的情况。后来我于今年3月听到一次在布里斯特尔举行的有关东帝汶的示威。我第一次意识到,联合王国有很多人在为东帝汶而工作。

从那时起,我发现了很多令人吃惊的事情。我听说很多记者在巴利博事件后试图同我和我父亲联系,但却被英国外交部告知我们不感兴趣。我发现外交部已在24小时之内被告知五名记者死亡的情况。他们知道细节,知道印度尼西亚人杀害了这些人,他们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那里正式得知这一情况,但却隐藏了事实。

这样,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又要求得到什么哪?有许多件事情。我要求委员会呼吁让东帝汶人民就他们的前途进行一次在国际监督下的全民表决。我还要求包括我自己的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停止散播关于东帝汶的不实之辞。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兄弟和他的同事们被埋在雅加达。我要求把他们的尸体对重新埋葬在东帝汶或者澳大利亚,这也是他们仍在生的亲属的要求。我要求对五位记者的死亡进行程序正当的调查,但最重要的是。我要求你们为东帝汶人民作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讲,如果布赖恩没有被杀害的话,这也会是他所要求的。

我想通过向委员会成员出示这块饰匾来结束我的发言。这是由索恩-EMI公司在我兄弟死后授予他的,以奖励他对东帝汶的报导工作。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迈克尔·范·瓦尔特·范·普拉格先生(未得到代表的国家和民族组织)在请愿人议席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范·瓦尔特·范·普拉格先生发言。

范·瓦尔特·范·普拉格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们高兴的在本委员会发言,因为它再一次审查东帝汶局势。莫贝尔抵抗组织全国理事会所代表的东帝汶是未得到代表国家

和民族组织的一个成员。现在为数已超过40个的未得到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和民族齐心协力,以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其合法的愿望。对诸如东帝汶这样的成员来讲,这种愿望包括他们国家的非殖民化和充分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我本人亲自来提交这份请愿书,是因为未得到代表国家和人民组织对东帝汶问题和本委员会工作所给予的重视。

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并且在法律上不容置疑。印度尼西亚于1975年对东帝汶的入侵曾多次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谴责。例如,1975年12月22日的第384(1975)号决议不仅对入侵进行谴责,还要求印度尼西亚立即撤出其武装部队并重新确认东帝汶的自决权。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19年来一直违背其国际义务。但这丝毫未削弱人民充分实现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权利。其实,如果说已经给该国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一造成死亡的这种对其人民的野蛮对待产生什么后果的话,那就是他不仅加强了要求自决的愿望,而且还加强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采取措施以确保这种愿望获得全面和自由实现的责任。未得到代表的国家和民族组织大会于1993年1月24日所通过的决议(GA3/1993/11)强烈的谴责了:

“对东帝汶人民的人权和土著权利的持续不断和公然的侵犯”。

我们对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持续作出的努力感到高兴,他在与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举行的多轮的会谈中努力为东帝汶问题谋求一种公正、全面和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又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外长于1994年5月在日内瓦的第4轮会议的结果。然而,未得到代表的国家和民族组织认为,在谋求对东帝汶问题作出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同时,有必要把东帝汶代表包括在内,参加秘书长的会谈。

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在最后一轮谈判中声明愿意与“东帝汶方面关于一体化的主要支持者和反对者”会面。联合国秘书长也应作出同样努力。我们恳求他在将于1995年1月举行的下一轮会谈之前或期间与莫贝尔抵抗组织全国理事会主席泽纳·古斯芒先生和该组织特别代表拉莫斯·奥尔塔会晤。我们建议本委员会向秘书长推荐采取这一行动。葡萄牙政府为东帝汶人民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必须得到赞扬。然而,在没有东帝汶抵抗组织领导人本人参加的

情况下,这一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这些领导人被他们自己的人民看作是东帝汶的合法代表。

未得到代表的国家和民族组织认为,由抵抗领导人泽纳·古斯芒首先提出并且随后由诺贝尔抵抗全国理事会特别代表和何塞·拉莫斯·奥尔塔于1992年向欧洲议会政治委员会正式提交的这份东帝汶和平方案为能够导致一种公正与持久和平的进程提供了最好的基础。我们今天也听到了该方案的详细内容。这一三阶段方案与东帝汶天主教会领导人贝洛主教的声明是一致的,并且得到葡萄牙的认可;它已将该方案提交联合国秘书长。我们建议,本特别委员会以及秘书长在与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和东帝汶的协商过程中将该方案作为协商的基础。

在1994年7月8日伦敦《泰晤士报》登载的一次专访当中,贝洛主教对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下所遭受的“经常发生的恶梦”进行了谴责。他重申举行一次全民公决以决定东帝汶未来地位的必要性,这要求过渡期间自治的“特殊地位”;该内容是在天主教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一次专访中透露的。进行全民公决的请求和过渡期间特殊自治地位的必要性还载于我刚才提到的三阶段和平方案当中。

贝洛主教还拒绝了一些人企图在排除所有帝汶领导人——特别是莫贝尔抵抗全国理事会、弗雷特林和UDT领导人——的情况下举行“和解会谈”的想法。依据联合国秘书长的观点,我们认为,所有帝汶人之间的对话都必须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赞助下举行,他的这些观点是在联合国于1994年5月6日发表的关于东帝汶问题的声明的第八点当中所表达的。

贝洛主教通过和平方式为促进东帝汶人民的利益所作的不懈努力应得到赞扬。他以温和态度成功地防止了岛上出现更严重的暴力和镇压事件并且继续批评印度尼西亚当局,对他的人民造成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尽管他这样做冒很大的风险。事实上,已经有过两次杀害主教的试图。第一次是在他于1989年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寄送一封密信之后不久。第二次试图是在1991年。贝洛主教在给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信中呼吁在东帝汶开始一个真正的和民主的非殖民化进程并要求举行一次全民公决。

贝洛主教在信中写道:

“印度尼西亚说,东帝汶人民已经选择合并,但是,东帝汶人民自己从来没这么说过。我们继续作为一个人民和民族在死亡”。

在日内瓦的上一轮会谈中,再次强调了联合国、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进入东帝汶的必要性。这符合今年3月9日在日内瓦通过的人权委员会的“协商一致宣言”。然而,应告知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实际上进入仍然非常有限。UNOP曾两次要求准许它和人权专家一起访问东帝汶,但是没有得到答复。5月以及本星期又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提出第三次要求,我附上这封信作为这个声明的一个附件。在阿里·阿拉塔斯阁下在5月的会谈中向联合国秘书长再次作出承诺后,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有利的回答。

结束时,我谨引用桑那那·古斯芒在辩护发言中的话,1993年5月17日在他被宣判无期徒刑前4天在帝力审判结束时他曾想宣读这个发言,但是不准他这样做。桑那那·古斯芒已成为东帝汶的纳尔逊·曼德拉,全世界的良心没有办法无视东帝汶。如果要在东帝汶恢复和平和正义,他就必须获释。以下是他的话:

“东帝汶问题是国际社会的责任,是一个国际法问题。这个案件涉及普遍原则,在这一案件中联合国的非殖民化准则受人操纵,印度尼西亚无视联合国历次决议,因此,这一案件是猖狂违反不结盟运动原则以及法律、和平和正义的普遍作法的原则。”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萨利·K·利维森女士(天主教国际关系学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利维森女士发言。

利维森女士(以英语发言):天主教国际关系学会自从我们去年向本委员会请愿以来继续监测东帝汶局势。在整整一年里,我们继续听到东帝汶人民,特别是东帝汶母亲们响亮而明确地为自由、正义和他们孩子们的回归而呐喊——自从至少273人死亡的1991年11月圣克鲁斯大屠杀以来,他们的孩子们仍然失踪和下落不明。

这些母亲们在去年秋天向美利坚合众国第一夫人发出的令人痛心的呼吁中,谈到了不知道他们亲爱的死难孩子们被埋葬在哪里所带来的巨大痛苦。然而他们仍然知道他们的立场:

“我们是个弱小民族,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脆弱,但是我们希望使我们反抗的火焰继续燃烧,这一火焰是我们具有作为一个自由和体面民族的特征。”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孩子失踪更令人痛苦:每天都带来盼

望的人可回家的希望,在太阳下山时没有消息使同一希望破灭,不能哀悼和不能接受死亡—死亡可能至少能解决天天、月月 and 年年等待的渺茫所造成的痛苦。

然而,在这块被蹂躏的土地上,有多少孩子失踪了,再也不能回来?还有多少会失踪—被当兵的在深夜拉走、殴打、受刑、致残、埋在没有标记的墓地里?

我们怎么能希望印度尼西亚军方会改变多年暴力的习惯而慈悲为怀?贝洛主教在去年秋天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生活在恐怖和压力的环境中。印度尼西亚人说,他们已从东帝汶撤走几个营,但那不真实。相反,他们正在所有地方增加军队的存在……只要军队和军方人员没有减少,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军事占领和独裁。”

天主教国际关系学会不仅关心选择公开表示拒绝印尼统治的所有东帝汶人的安全,而且特别关心其在罗马天主教牧师中的代表。我们关心帝力教区教皇执行者贝洛主教。我们注意到,自从贝洛主教帮助参加圣克鲁斯示威的人以来,天主教会就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根据主教和东帝汶境内牧师和教会人士的说法,印尼军方经常干预教会事务,骚扰去教堂的人,对他们进行威胁和指责,并散布复仇性的假情报,猖狂企图将其人员搞臭。曾经企图暗杀主教及其牧师,我们认为他们天天都在危险中执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知道主教和东帝汶牧师们都不怕死,他们受到牺牲的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蒂古的鼓舞。罗梅罗大主教1980年3月在作弥撒时被敢死队暗杀。他一生中毫不畏惧地大声疾呼反对不正义和压迫。

贝洛主教说过,目前局面绝不会导致联合国批准东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因为

“人民仍然生活在恐惧中。他们不敢在夜里出去。许多人,包括年轻人,被叫去盘问……如果人们谈论他们的权利,他们就被指控为东帝汶人民解放军或秘密组织的成员。”

主教要求给予东帝汶自治,尊重其宗教传统。他最初在1989年提出的公民投票是“必要和紧迫的”。他说,

“如果局面有所改善,人们已经生活在平静之中,那我们为什么害怕公民投票?”

东帝汶问题是政治性的,只能通过认真和长期谈判解决。在忆及《联合国宪章》时—它声明只有主权人民才能决

定其未来,我们谨强调如果东帝汶人民被剥夺这一基本权利,联合国的授权将受到破坏。我们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呼吁遵守其声明,它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发言中同意继续调查1991年11月12日帝力大屠杀,调查仍然失踪者和围绕这一事件的情况。

最后,我们要求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主持下继续同葡萄牙和东帝汶人民的合法代表,包括其被监禁的领袖桑那那·古斯茅进行对话,以决心和善意解决这一悲惨和不必要的冲突。让失踪和暴力行为在东帝汶结束。让母亲们不再悲伤。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艾丽莎·玛丽亚·拉莫斯·达米奥女士(代表葡萄牙议会成员,葡萄牙社会党)玛丽亚·特拉萨·桑塔卡勒拉女士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达米奥女士发言。

达米奥女士(以英语发言):自从1977年以来,葡萄牙作为东帝汶管理国一再通知秘书长,一个前殖民主义受害者转变为粗暴的殖民者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武装部队继续进行占领。

葡萄牙一再被阻止履行对东帝汶的职责,这是一个在其管理下的非自治领土。具体的说,它未能通过全民投票确保东帝汶人民在决定其未来方面行使作出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承担我们的责任时,谨请再次回顾一下特别委员会的责任。

自1975年以来,大会一直要求印度尼西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从东帝汶撤出武装部队,但迄今未取得实质性结果。大会在三十七届会议上通过了1982年11月23日第37/30号决议,授权秘书长同有关各方进行磋商,探索各种可能性和方法,以达成可接受的解决方法,并在下一届会议上向大会提出报告。在1983年至1994年的11年期间,尽管秘书长作出了努力,大会只被告知它的斡旋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秘书长的赞助下,1992年12月在纽约、1993年4月在罗马和1994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外长级非正式会谈。不幸的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只关心粉饰其国际形象,毛比雷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实际改变,最近几个来源的有关于段日益高明的违反人权情况的消息使印尼的形象失去光泽。

今年4月,只是为了改善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舆论中的形

象,有一群记者被允许访问该领土,但始终是在陪同之下进行。一位记者在1994年3月16日的《卫报》中报道,印度尼西亚自1975年以来建立起来的无情的控制机构仍在活动,存在着一种恐怖、威胁和战争的气氛。警察驱散了少数几个年轻学生在记者旅馆面前进行的简短的示威和另一个在教堂附近支持萨纳纳·古斯茅争取东帝汶斗争的示威。7天之后,印度尼西亚宣布拘留6人进行审讯。东帝汶消息来源报道说,12人未受具体的指控而被拘留。

大赫国际说,这些逮捕符合一种长期的格局,这就是短期拘留和虐待印度尼西亚统治的真正或据称的政治反对派。这12位被拘留者中只有一人获释。在1994年6月24日,据报道,有3个学生因进行示威,在来访的外国记者面前表达反印度尼西亚的情绪而被判处坐牢20个月。

尽管秘书长作出了努力,人权委员会和非殖化特别委员会未能停止暴力和镇压。东帝汶人有三分之一以上已被杀害。我们最担心的是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人的未来。他们还要抵抗军方和警察的虐待多久呢?这种虐待的目的就是要以恐惧来消灭他们的特征、文化和对国际声援的希望,假使这种声援永远不会实现?

自从圣克鲁斯屠杀以来,至少有400个帝汶人未遭指控而被拘留。其中许多人不能与亲戚、律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见面。有关暴力占领领土的国际法承认反抗权利,然而,有20个帝汶人因为颠覆和其他政治罪行而被判终身监禁;其中3人自1984年以来一直被拘留。

由于国际压力和印度尼西亚人权组织的行动,我们能够保护人的生命和改善进入东帝汶的机会。但是,去年,军事当局强行严密监视红十字会和外国代表团的访问。

今年1月,萨纳纳·古斯茅受到惩罚,在获悉他曾写信给葡萄牙当局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时,他被暂时终止接受访问。

我代表葡萄牙人民并作为他们的一位代表,以最严重的关切请本委员会采取行动并迅速采取行动。一项可被接受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法的不能容忍的拖延每增加一年、一天都要东帝汶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和经受更多的痛苦。

今天,委员会听到可信的国际机构作证说明对东帝汶人种族灭绝、性虐待和民族清洗。波斯尼亚的这种不文明行为使世界感到震惊,但是,强大的民族国家对东帝汶的情况却保持令人不可理解的沉默,这些国家看来对类似的情况有着不

同的判断。

帝汶人抵抗暴力入侵的统治者的能力是惊人的。但是我们知道,本委员会知道,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意图证实了联合国为捍卫和平所作的努力日益削弱。

鉴于这些事实,我们重申,迫切需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创造条件,开始一项进程——葡萄牙作为管理国有责任这样做——导致东帝汶人民的自决。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杰拉尔德斯先生(葡萄牙议会议员,葡萄牙社会民主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杰拉尔德斯先生发言。

杰拉尔德斯先生(以英语发言):自从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以来,19年已经过去了,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曾为自己的自由而进行光荣战斗的前殖民领土。1975年对东帝汶的入侵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国际社会从未承认对该领土的单方面吞并。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于1975年12月12日通过了有关印度尼西亚入侵的第3485(XXX)号决议,承认葡萄牙为负责管理东帝汶的国家。在同年12月22日,安全理事会一致——我谨强调“一致”——通过了有关同一议题的第384(1975)号决议,该措词相同的决议坚持要求印度尼西亚从东帝汶撤出武装部队,并回顾东帝汶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

在过去19年中,帝汶人民有三分之一以上已被残暴、野蛮的印度尼西亚警察和武装部队杀害。自从1975年12月以来,恐惧、暴力、镇压、酷刑、家庭生活中断以及企图摧毁帝汶文化及其宗教信仰的企图,在东帝汶已经司空见惯。

人必须要到一定的年龄才能懂得生活并非公平和公正的。但是我要试问,这对帝汶人民来说是否代价太高?

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本委员会上印度尼西亚真正的代表对他的国家的武装部队对东帝汶家庭不断犯下的残暴罪行感到如何?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难道他不感到羞耻?他晚上能够睡得平安吗?我断定他不能,因为我相信,而且我肯定,他是文明世界的一员。

印度尼西亚认识到,东帝汶境内目前的局势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在最近的马尼拉会议上,印度尼西亚表现出紧张不安的迹象,清楚地表明,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局势感到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无把握。

事实上,东帝汶事件已在世界各地得到越来越多的支

持,不论在政府或非政府一级。欧洲联盟已经反复要求印度尼西亚结束在东帝汶境内有系统地践踏人权的行为,并且强调东帝汶问题必须取得一种公正、全面和国际可接受的解决,充分尊重东帝汶人的正当利益和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

在美国,在行政当局和国会中,对东帝汶问题的认识也正在增长。去年取消约旦向印度尼西亚出售F-5E型战斗机,中断为印度尼西亚参加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方案提供资金,以及今年中止出售致命的防暴设备,肯定都是积极的步骤:由37名参议员和101名众议员签署两封信,促请柯林顿总统在西雅图举行的上届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首脑会议上,同苏哈托总统讨论东帝汶问题,这也有重要意义。

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下,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外长举行了四轮会谈,在5月6日于日内瓦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中载有有关执行今年3月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通过的关于东帝汶境内人权状况的主席声明中所载的各项建议的某些重要安排。

自从1992年以来,人权委员会上对东帝汶问题讨论已经发展到一种不同程度。印度尼西亚在这些会议上紧张不安,清楚地表明风向已经发生了变化。

然而,尽管有上述的各种积极步骤,但大赦国际在其年度报告中,仍然一再报道东帝汶境内有严重践踏人权行为。

今年4月,一组被允许在陪同下访问东帝汶的记者也报道说,骚扰、拘留和酷刑仍然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内容,而且那里存在着一种害怕与恐怖的气氛。这些记者的报道和大赦国际的报告显然表明,印度尼西亚有两张面孔,一张应付国际社会,另一张是内部的恐惧和残暴。因此,我促请国际社会,并通过本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以结束东帝汶人民长期痛苦的遭遇。

最后,我愿向委员会各成员引用帝力教区主管贝洛主教在最近一次报纸采访中讲的一段话:

“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东帝汶的存在造成一种恐惧的气氛,而且情况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直到该领土人民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这非常简单。这是结束东帝汶人民的痛苦与苦难的关键。

最后,我要感谢委员会耐心地听我发言,让上帝保佑所有善良的人们。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纳兰纳·西奈·科伊索朗先生(葡萄牙议会议员,社会民主中心党)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科伊索朗先生发言。

科伊索朗先生(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字叫纳兰纳·西奈·科伊索朗。我是葡萄牙议会的成员。

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20个请愿者发言,他们向本委员会尊敬的成员们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真实记录,诚实地说,这部记录就是从1975年到今天,爪哇帝国主义者对东帝汶的入侵。这是一部发生在被牺牲了的东帝汶民族身上的悲剧的历史,一部他们作为个人和人民的权利每天遭受一个军事上强大的邻国践踏的历史,这一邻国滥用它的力量和实力,把它专制和任性的统治强加在无力自卫但却自豪的毛巴拉人民的头上。在南非种族隔离崩溃后,他们现在成了遭受殖民统治的最大人口。

除了今天所报道的各种暴行以外,我们还必须指出宗教践踏,穆斯林士兵和军官亵渎教堂,冒犯神圣,破坏圣规,打断弥撒,对圣坛吐唾沫,以及令人作呕地嘲笑帝力教堂内的圣餐。人们难以想像,在20世纪末,一个被承认的国际社会成员,联合国会员的国家,竟能采取这种必须被认为是野蛮和不文明的行为,把东帝汶变成军事暴力的实验场,变成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侵犯东帝汶天主教徒宗教权利的场所。自由世界已经谴责了帝力主教希门尼斯·贝洛先生称之为日复一日的恶梦,急切需要让马巴拉人民最后决定东帝汶的未来。

东帝汶问题必须被放在国际社会没有能力确保尊重人权和各人民自决权利的背景下来看。从非洲到前南斯拉夫到亚洲,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在世界各地存在。但是,如果说这种场面令人遗憾,那么,大国滥用它们的实力以促进它们自己的利益,更是不能让人容忍。

卢旺达的情况与东帝汶不同。在卢旺达是内部势力在互相争斗。而在东帝汶是一个军事大国在滥用他的势力和国际联系欺压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侵略并占领了该领土宣布把他兼并,这些都是国际法所谴责的行为。他还杀害了数以十万计的东帝汶人,这种种族灭绝罪行最终会,而且应该有一个国际法庭执行审判。不可接受的是,诸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大国声称他们非常担忧非洲或南斯拉夫的局势,但同时却接受太平洋发生的这一局势。我们呼吁他们将遵守国际法和基本道义原则放在他们的利益之上。我们强烈重申,

如果联合国不保护弱小的民族,那么他们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面前便毫无防卫能力。今天我们以一个由于印度尼西亚侵略者的入侵而处于灭绝边缘的民族的名义发出这一呼吁。

现在联合国应该对印度尼西亚采取坚定的立场,恢复自决权的法则,这是承认东帝汶人民尊严的第一步。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米盖尔·乌班诺·罗德里格斯先生(葡萄牙议会议员,共产党)在请愿者一起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罗德里格斯先生发言。

罗德里格斯先生(葡萄牙议会议员,共产党)(以法语发言):在本届会议上,不同国籍的请愿者来到非殖民化委员会面前谴责东帝汶局势,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以使毛比雷人民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此时,我们看到了国际社会无法确保《联合国宪章》得到遵守的一个例子。

18多年来,雅加达政府一致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谴责入侵东帝汶的决议。我要冒昧地提请委员会注意印度尼西亚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目前僵局的一些方面。印度尼西亚正在采取的政策是该共和国成为一个目无法纪的国家。

与1993年一样,印度尼西亚政府1994年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作出了一些承诺,但再次没有遵守这些承诺。在与葡萄牙政府进行的会谈中,阿里·阿拉塔斯外长要求采取建立信任措施。然而在东帝汶,占领者一直采取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政策。

大赦国际关于这个问题的上一份报告写的非常清楚,访问过该领土的各国议员的声明也很明确。今天委员会听取了大赦国际代表的发言,他会报了非常严重的事实;委员会还听取了康斯坦西奥·平托先生的有力证词,他列举了印度尼西亚的种种暴行,包括谋杀一位名叫马西罗的青年。我们还听取了来自英格兰布里斯托尔的托尔弗里夫人所作的发言。

约翰·皮尔杰尔拍摄的一部有关圣克鲁斯大屠杀后在帝力医院所发生的残杀事件的影片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几星期前,我们在葡萄牙议会听取当时在医院的帝汶人描述了这些发骇人听闻的事件和他们所遭受的酷刑。葡萄牙代表还听取了访问帝力的瑞典议员的证词,他们发现占领者在那里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

印度尼西亚政府还通过对某些国家政府进行游说和施加压力来干预海外事务。其中一个例子是企图阻挠马尼拉会议的召开。幸运的是,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的独立性和一些知

名人士,例如马尼拉红衣主教贾姆·辛恩的鉴定立场使这次会议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国际声援行为,会上所作的谴责有助于使全世界千百万人了解苏哈托将军的政权在东帝汶所犯的罪行。目前正筹备在马来西亚举行一次类似的声援会议,因此我们预期雅加达政权将会给吉隆坡政府施加新的压力。

我希望提请注意的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一种共谋行为,他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得以制造一种东帝汶人民无法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的书面。没有一些主要工业化大国和强大国际组织的不正当支持,印度尼西亚便无法推行其不断顽抗,无视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的政策。

我想作为黑色幽默的一个例子谈谈欧洲委员会的态度。该委员会把苏哈托将军的外长阿里·阿拉塔斯的名字列入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卡·阿里亚斯在内的杰出人道主义者名单。阿拉塔斯先生是被授予“普遍人权模式推动者”称号的人之一。更加丢脸的是,雅克·德洛尔斯先生主持了将这位部长封为人类美德典范的会议,而他是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采取的暴力和种族灭绝政策的策划人。

一些国家,包括美国、联合王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苏哈托将军的政权——爪哇帝国主义独裁政策。上星期,一些人权组织在巴黎世界银行外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亲印度尼西亚协商小组成员国对雅加达的财政支助。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1993年,印度尼西亚获得的各种援助和投资超过了51亿美元,他希望今年得到更多。这的确是对无视西方民主国家所认为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的国家政权的奖励。

美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支持是最重要、最丑恶和最不道德的。该国国务院1994年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报告有助于我们清楚了解这个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大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矛盾作法。该报告在强调印度尼西亚经济表现出巨大活力的同时,描绘了该政权的可怕的一面:独裁、腐化、酷刑以帝汶、伊里安查亚和亚齐特区的游击战、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裙带关系。报告中提到东帝汶的许多地方正是象我们确认,华盛顿承认在帝力存在着专制统治,对桑那那·吉斯矛的审判是一场司法审判闹剧。国务院承认,他完全清楚在东帝汶发生的一切。但是,美国却把印度尼西亚对该领土的兼并看作是一种即成事实,从而采取一种蔑视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的立场。

这项政策由来已久。真理不能掩盖。美国一直鼓励和支持入侵东帝汶，对占领后发生的种族灭绝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在一位著名的美国人内姆·乔姆斯基先生为由毛巴拉抵抗运动领导之一拉莫斯·霍塔先生所写的题为“帝力的明天”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乔姆斯基特别回顾到，福特总统和亨利·基辛格于1975年12月前往雅加达，为入侵开放绿灯。联合国的行动然后遭到华盛顿的阻碍。

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大使在1976年1月23日发给国务卿基辛格的一份电报中说，他成功地完成了他的秘密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美国想要事情以它自己的意图发展，并且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国务院想要联合国在采取任何措施方面完全无效。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罗德·诺兰在访问帝力后在一份报纸的大标题中概括了毛巴拉人民的悲剧：“帝汶仍然是一块饥饿、镇压和贫困的土地。”

他说的对。然而，任何人不能混淆一切。一个人必须把苏哈托将军独裁统治下的爪哇人帝国和应得到我们尊重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区分开来。同样，美国人民不对美国政府同雅加达政府的相互勾结负责。我要赞扬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要的美国报纸声援东帝汶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

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应受到谴责。我象其他人一样相信，东帝汶人民获得自由，并且实现他们在长达18年之久的占领和恐怖中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英勇主义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的一天将到来。我希望——葡萄牙人民希望——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能够为确保这一天将尽快到来作出贡献。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马罗先生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马罗先生发言。

阿马罗先生(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字叫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马罗。我是革阵、东帝汶解放党前主席和缔造者，我后来成为东帝汶民主主义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我要感谢委员会给我这个机会就东帝汶问题发言。我也非常想借此机会向抽出时间为东帝汶人民工作的联合国、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所有人表示衷心感谢。这些努力和考虑并非没有得到

东帝汶人的赞赏。

我来到本委员会并不是要谴责或反对任何个人或人民。因为我必须相信，那些采取这些行动的人真的相信，当时这些行动是正确的、公正的。然而。自关于东帝汶地位的辩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以来，我注意到一种认为东帝汶历史始于1975年的倾向。在这个时期以前，东帝汶似乎不存在，并对世界来说仍然是个谜。但是，我们过去确实存在。450年来，我们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令人痛心的是，在被世界忘记了这么长时间后，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被某些人用来再次牺牲我国人民的真正利益为代价追求自己的利益的问题出现。这使我们既伤心又愤怒，这是为什么我要求今天在此发言的原因。

提出的关于东帝汶的事实大部分是偏面的，是由那些喜欢沉缅于自己的声音和对发生的事情的看法的人提出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听到在东帝汶发生的一切的事实真相，那么让我们听一下完整的故事。我们必须承认东帝汶人残酷的殖民经历，那时，葡萄牙人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压迫、剥削、分裂和屠杀我们的人民。正是葡萄牙在1975年在帝汶人之间煽动战斗和屠杀，使兄弟泥墙，父子反目。正是葡萄牙故意使我们陷入内战，不再管我们的命运。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是那场内战的主要参与者，为东帝汶的独立而战斗。

请允许我谈谈我的一些亲身经历，这已经同东帝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当时我11岁，有1 000多帝汶人被放逐到阿陶罗岛上。这些人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会读书和写字。他们当中只有200人生存下来，包括我的两个表兄弟，其中一个仍活着。我的兄弟逃出这个监狱，葡萄牙总督安东尼奥·马里奥·达塞尔帕·罗萨上尉重金悬赏他的头。

1956年，在起义之后，许多妇女和儿童和老人在华图拉里和华图卡堡海滩被葡萄牙士兵枪杀。其他人被放逐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萄牙。

历史还表明，葡萄牙在宣布东帝汶为一个海外省后，并不想要联合国介入。事实上，《葡萄牙宪法》中写到，葡萄牙仍然对东帝汶非殖化和独立负有责任。只是在事情发生突然变化之后，葡萄牙才求助于联合国。

今天，某些葡萄牙政治家坚持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上企图出卖我们这些骨瘦如柴的人以得到他

们所想得到的东西。他们真的认为东帝汶人能够在另一场内战中幸免于死吗？上帝宽恕我，但是我不相信他们能够幸存。我深信如果印度尼西亚象葡萄牙一样放弃东帝汶，这将使我们陷入另一场内战，也许造成比第一场内战更加可怕的后果。

让我们清楚地、现实地看待东帝汶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再一次有一些人通过提出不真实的希望和毫无根据的梦想使帝汶年青人相互斗争，就象他们对我们一代人所做的那样。我们长达450年的痛苦经历显然还不够长得让他们吸取教训。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对我来说，原因是明确的。东帝汶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商品”，被用来满足既得利益。

让我们看一看现在被提出来的一些要求。据说东帝汶是一个封闭的领土。这是不对的。东帝汶实际上向严肃和公正的访问者及专业的人权组织开放。外国记者、议会成员、外交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很多其他组织都曾到那里访问。实际上，尽管一些记者的报告不是赞许性的，然而能够写出这些报告的事实就证明了东帝汶的开放。但我必须承认，从某一方面说东帝汶是关闭的。它对那些其主要目标不是获得对情况的第一手了解而是为自己利益捏造事实的外国活动分子和政客关闭。我如果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成员的话，也会限制他们的进入，他们的行为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彻底的讹诈。

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于1991年11月12日发生的不幸的圣克鲁斯事件。它是怎样发生的？革阵秘书处于1994年2月24日发表的公报本身指出，事件是在极端政治和社会动荡气氛中发生的，并证实人群中有煽动分子的存在。我在自己的调查中接触了作为示威者而直接参与或目睹事件的旁观者的东帝汶人，这一调查也证实示威是野蛮、不守规则和挑衅性的。

我丝毫不想为开枪找理由。我对事件深感遗憾。使我们东帝汶的兄弟们血洒圣克鲁斯。然而印度尼西亚人民以及苏哈托总统也为此深感遗憾，他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事件再次发生。然而，仍有人继续利用这一事件来达到他们所抱有的任何反对印度尼西亚的目的。他们做这种事令人作呕的一面是，他们谁也没有谴责那些在幕后操纵其生命刚刚开始年青人使他们陷入具有潜在危害的地步的人。

这些人继续向东帝汶青年人提出不实的希望。他们在谋划、耍花招和寻求对雅加达的优势时，乐以牺牲年青人的生命。我有一次同一位青年的圣克鲁斯存活者交谈，并问他为什么参与政治示威。他自豪地说：“作为一个年青的东帝汶

人，我必须为独立而战。”“你太年青了，不知道什么是独立及其后果，”我对他说。他对此问答到：“没关系。”我继续问他是否他肯定独立会很快到来。“是的”他回答说，“因为根据我听到的消息，葡萄牙议会成员将同联合国成员一道到东帝汶来”。“怎么来？”我问道。“你是否真认为葡萄牙人将会为结束一场新的内战而投入政治意志和资源？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以前曾为消灭我们而把我们放弃，他们那时把我们看成是负担。看一看现在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那些葡萄牙人和活动分子确实是在帮助制止那里的苦难吗？”他没有任何答复。我相信如果向国际社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回答也会是同样的。

我讲这段事的原因是要向委员会表明，象东帝汶年青人提出的这种不实的希望和梦境，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我们可以在本委员会这里就对错和谁对历史的解释是正确的问题进行冗长的辩论。我们搜集文件，享受一顿美餐并转到其他关心的事情上去。然而对于东帝汶年青人来说，这种幻觉呼唤年青人采取行动并促使他们在毫无希望和可质疑的冒险中作出承诺和冒生命危险；一些人在圣克鲁斯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我本人曾为东帝汶独立而战，实际上是开始并领导战斗的几个人之一。但是我现在自豪地说，在分析了有关使东帝汶继续存在的最佳途径的所有辩论之后，我自觉地接受了印度尼西亚公民籍并同意让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其他各省统一起来。印度尼西亚毕竟是一个拥有360个种族群体的国家。我们东帝汶人与作为自1945年独立以来成为印度尼西亚大家庭一部分的生活在西帝汶的人同属于一个种族群体。我们的祖先不是因为自己的愿望、而是由于殖民计划才被分隔开来的。

我们还要继续洒热血、牺牲年青人的生命并对未来丧失一切希望吗？我们还要因为外国政客和活动分子的推动而牺牲生命吗？这些人一直都享有安全和保障，并在说过和做过这一切之后为东帝汶写一篇优美的颂文，表达他们的遗憾，然后进行下一次征讨运动，而这种运动的失败则给他们自己带来有限的危险。还是我们应意识到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关注带来了发展、稳定的希望及450年占领的结束？

最后，我要向我的东帝汶朋友们发出呼吁：我们东帝汶人要停止听那些政客及其国际上的朋友所提出的许诺和空洞的梦想。确实，很多代表东帝汶工作的人是出于诚意的，

我确实赞赏他们所作的努力。实际上,我们最终都是在为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对东帝汶人来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政治及大国的更大利益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而如果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子女享有更美好的生活,那么我们的做法就必须是通过同印度尼西亚的一体化,并作为印度尼西亚人为我们的共同繁荣而努力。

并为一体不仅意味着东帝汶属于印度尼西亚,而且整个印度尼西亚属于东帝汶。尽管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至少愿意拿出有限的资源来建设东帝汶。应当努力推动我们东帝汶的青年人进行建设而不是破坏其未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尤其是东帝汶及广泛的印度尼西亚。这是我们应为之奋斗和实现的梦想。这是我们能够在这一不尽完美的世界中生存和繁荣的最肯定的道路。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保利诺·加马先生(帝汶国际人权秘书处和帝汶囚犯兄弟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加马先生发言。

加马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是独立东帝汶革命阵线(弗雷蒂林)武装派系东帝汶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法林蒂尔)的前作战指挥官,我从1975至1985年在东帝汶深山当中呆了10年,以反对印度尼西亚当局在我的家园的存在。

我于1990年设法逃离雅加达去了泰国并建立了两个东帝汶人权组织:帝汶人权秘书处和帝汶囚犯兄弟会。我当时决定谋求新的方式以保护我自己人民的完整性,不受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虐待。

在1991年11月12日圣克鲁斯事件之后,帝汶国际人权秘书处和帝汶囚犯兄弟会强烈谴责了印度尼西亚军方的行径,但承认印度尼西亚中央当局立即展开的对这一悲剧事件进行调查并且找到肇事者的努力。

最后,经过印度尼西亚的报告与我们所作的现场报告进行比较,我们认识到此次事件是某些个人的孤立行为,并且还由于葡萄牙远距离进行干预在时间、地点和动机方面的情形。

今天,东帝汶人民对日益增长的对人权的尊重更具有信心,因为印度尼西亚当局在实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的各种建议;这不仅是在东帝汶而且在印度尼西亚各处,最近,帝汶人权秘书处和帝汶囚犯兄弟会得到在东帝汶进行公开活动的允许。我们希望不久开设一个由知名帝汶人权活动家领导

的小型办事处。

我们必须逐渐地继续使我们自己从这一漫长的悲剧中解救出来。我们必须改变葡萄牙与印度尼西亚之间对话的性质。以便对全面解决东帝汶问题提供条件;该解决方案应包括帝汶的代表权并得到远至1975年的历史承认。

因此,帝汶国际人权秘书处和帝汶囚犯兄弟会无条件地支持秘书长发起的在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实施建立信任措施的努力,从而为我们人民的稳定、和谐与进步实现最佳解决方案。

我相信,本委员会也将在帮助联合国使它在世界的这一非常重要的地区维持和平的作用作出贡献。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西德尼·琼斯女士(亚洲人权监督)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琼斯女士发言。

琼斯女士(以英语发言):众所周知,我们这个从前被称为亚洲监督的亚洲人权监督组织对东帝汶的政治地位不表态,但我们认为,对那里人权局势的全面了解肯定会对委员会就非殖民化问题进行的辩论提供情报。

东帝汶既不是卢旺达,也不是波斯尼亚,它是一个草率拘留和使用酷刑已成为家常便饭的地方,那里的言论、结社和集会的基本自由已经不存在。失踪和处于政治原因的枪杀已变得较为罕见,但仍时有发生。当这种情况得到报道时,对情报的控制和接近该领土是如此困难,以致即便对印度尼西亚非政府组织来讲也几乎无法展开符合公正和彻底的国际标准的调查。印度尼西亚人权委员会尽管有许多缺陷,但至少是一个听取印尼公众意见的有用的传声筒;但即使该委员会自1994年6月以来也未能正式走访东帝汶或对报道中在那里出现的许多件侵犯人权案件进行调查。

印度尼西亚政府最近采取了一些值得令人称赞的措施。例如,我们对巴克·韦利·恩达耶先生刚刚结束的对东帝汶的访问一事表示欢迎,这位因为知名的塞内加尔律师,目前担任草率和任意处决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员。但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东帝汶人士反复对我们讲的印尼军方在外国人的高姿态访问之前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保安准备。这些准备工作通常包括逮捕可能的“闹事者”,并且事实上我们懂得在恩达耶先生的访问之前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某组织或个人可能走访的地区居民事先受到提醒,并且一些官员将

访问者在帝力可能下榻的两座旅店的大多数房间预订下来。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的调停下于6月30日还允许抵抗领导人泽纳纳·古斯芒的家属到雅加达的艺槟榔监狱对他进行探访。这是古斯芒在近20年当中首次能够见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现在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居民。这种人道主义姿态是值得欢迎,但这只是在古斯芒被长期单独监禁在艺槟榔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他在那里不准接待来访者,不准看报纸,据称是对他从监狱中秘密写信给支持者的惩罚。这种待遇违背了《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

我们还遗憾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政府作出的将六位因1991年10月和11月间被判刑的东帝汶人从帝力转移到三宝垄的决定,他们在那里将不能接见亲属和朋友。

总之,东帝汶的人权局势仍然是暗淡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虽然新的失踪案件较为少见,但仍存在数百件悬而未决的案件,并且在对1991年11月屠杀事件之后仍然失踪的人或者近期失踪的人作出解释方面也没有取得进展。

在帝力的加斯帕·卡洛斯的亲属于1994年5月向一位访问人士透露,他在被军事情报部门于1992年9月3日逮捕之后仍然下落不明;该部门在当地以SGI闻名。此事发生在不结盟运动在雅加达召开的首脑会议之前。加斯帕失踪时30岁,当时是帝力的布米达亚银行的雇员。军方告诉他家属,他的逮捕是与雅加达首脑会议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有关的一部分,因为他一直计划与一些其他人去雅加达以便向不对盟运动代表就东帝汶的局势提供情况。加斯帕先被带到帝力的SGI在科尔梅拉的办公室,并在几天后又带到帝力的设在巴力德的科马卡监狱。那以后不久他便在夜间从狱中带走并从此再无音信。他的家属曾多次向帝力军方查询,并于最近求助于印度尼西亚国家人权委员会。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仍留在帝力。由于在他被逮捕后他的雇主布料达亚银行将其解雇,家庭则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我不想在此提及我的同行已经提到过的一些事件,但我想着重提一下各人权组织进入东帝汶的情况。尽管印度尼西亚外长阿里·阿拉塔斯在5月初所声称的他将邀请大赦国际和亚洲监督-现在称为亚洲人权监督-访问东帝汶,但自从1993年3月亚洲监督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获准出席经过选择的泽纳纳·古斯芒的审判以来没有任何人权组织被允许进行访问。我们于1994年6月被明确的拒绝访问东帝汶。

不仅国际人权组织去东帝汶有困难;印尼人权组织也一样。5月初,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专题座谈会本来应在帝汶大学举行,由若干印尼非政府组织主办,它们是称为保卫东帝汶联合委员会的一个联盟的成员。这包括印度尼西亚一些最受尊敬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如法律援助学会、印度尼西亚教会理事会、社会倡导和研究学会。座谈会举行之前一周,包括东帝汶在内的地区军事指挥官打电话给大学教务长并告诉他会议应延期。开会时,印尼非政府组织没有获准参加,东帝汶环境组织ETABEP的东帝汶成员萨尔门托也没有获准参加。

总之,东帝汶仍是一个麻烦的地方,那里的人权继续受蹂躏。更大的公开性--即东帝汶人有自由在私人住宅聚会而无需许可并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外国记者可以不受阻拦地进入,对外国来访者减少控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进入--几乎肯定有助于防止这种蹂躏并确保受害者得到某种形式的平反。但是上几个月的情况如果可以作为信号的话,趋势不是走向开放而是相反。6月21日关闭了雅加达三家重要的新闻周刊对东帝汶也有影响,因为它表明想控制政治上有权势者认为讨厌的信息。限制信息使问题得不到公开,不能在各条战线上找到解决办法,而不只是人权方面。对东帝汶以及印尼本土,这可能是十分有害的。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何塞·马丁斯第三(帝汶解放组织)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马丁斯先生发言。

马丁斯先生(帝汶解放组织)(以英语发言):据我了解,在1993年7月13日,何塞·路易·古铁雷斯先生以东帝汶的尊严在这个委员会讲话,这使那些利用我国人民名义为自己在国际上沽名钓誉的外来者处境不妙。这样,古铁雷斯先生加强了秘书长教导所有帝汶人首先建立一个对话纲领的努力,这种对话将使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能为东帝汶找到一项公开的国际上接受的解决办法。

的确,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因葡萄牙当局不负责而在1974年挑起了内战的受害者和主角如果死不同头地相对立的话,我们怎能解决东帝汶问题。当所有东帝汶的真正政治领导人不肯在不受任何方面干涉的情况下面对面地坐下来,联合国的善意和真诚意愿怎么能成为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的会商创造条件?

我是东帝汶政治中最老的政客。我在1962年我就是葡萄牙殖民国的政治犯。因此，我能逐一驳倒提出的断言和论点，包括所有葡萄牙政党和国际团体提出的断言和论点，我的办法就是证明东帝汶从来没有过非殖化进程，只有过一个使东帝汶人在一场血腥、不人道的内战中自相残杀的简单阴谋，其目的就是讨好在共产主义和民主之间进行斗争的外国利益。

当我写这个发言时，我不能肯定何塞·拉莫斯·奥尔塔先生是否将出席委员会会议；如果他出席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血缘兄弟之间的非正式会晤以确立一个世界舆论希望我们大家确立的最重要目标：尊重我们亲爱的东帝汶人民这个唯一的在500年连续不断的劫难中受磨炼的人群并为他们服务和作出牺牲。

奥尔塔和我历来了解对方的政治立场；我们在抵抗运动中还曾经是多年的伴侣。然而，何塞·奥尔塔同那些他明知其目的是利用东帝汶来对付印尼的人有20年的关系，这使他受到损害。我自己在去年决定不再向一个抵抗运动作出任何贡献，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技术上、财政上和意识形态上已不再是东帝汶的真正ASUAINS BARANI：印度尼西亚在尊重我国人民的完整和福利方面已大有改进，我们已得到保证，由于公共秩序局势而由个人在现场临机处置造成的11月12日圣克鲁斯事件的悲惨案件不会重演。

我在我的组织中的弟兄们有着东帝汶的最高资格和反抗运动的经历，可以向世界舆论谈话。泽维尔·拉马拉尔先生曾是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他救过许多人的生命并几乎被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激进革命成员所杀害。10年来，保利诺·伽马先生是最有资格的游击队指挥官，并建立了帝汶游击队MAQUIS。

有三位东帝汶进程中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在战场上原来是意识形态的敌人，现在在我们当代历史中第一次放弃所有个人利益以便创造条件使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能允许我国人民最终实现和平、秩序、和谐和发展。此外，葡萄牙现任外交部长听取了帝汶各方面意见，表现了真正政治家风度。

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目标：尊敬印度尼西亚这个我们古老的祖先大树，我们共同的生物和人类来源，并向葡萄牙致敬，它在我们祖先被殖民主义恐怖和暴力大规模杀害时带来了基督教的温暖光芒。

今天，有些人要讨论过去18年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存

在。但是他们之中有谁想了解我们在没有大众媒介和国际论坛的时候在最可怕的情况下悲惨地屈服于葡萄牙殖民主义？我们是我国人民生存和继续的保卫者，我们要同印度尼西亚人、葡萄牙人和全世界实现和平与和谐；我们不想把我国人民作为牺牲品贡献给鼓动和剥削的小神。

我冒昧地认为，在委员会尊敬的成员中，有一些也许最初来自过去曾经历殖民主义的国家，其后果是他们自己人民的一部分曾被“迁移”到被外国认为理想的政治边界，这些外国毫不尊重民族和原本语言模式。这当然是经常成为永久冲突根源的惨剧。

东帝汶的情况是类似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在没有得到任何许可的情况下把帝汶岛一分为二，只是为了巩固其自己的殖民主义剥削利益。自从1914年以来，我们帝汶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任凭由于1851年葡萄牙总督洛佩斯·德利马把弗洛勒斯、阿杜纳拉、索洛尔、阿洛和西帝汶卖给古邦荷兰居民的非法私人买卖之后，葡萄牙和荷兰在瑞士同意对帝汶岛的瓜分。

实际上，我们对背着我们进行的交易感到厌倦了，我们也不得不说，葡萄牙从未尊重同东帝汶留拉伊人商定的条件，“要保护该领土，充分尊重其自己的人民”。正当我们在葡萄牙革命者挑起的一场肮脏的内战中进行斗争的时刻，葡萄牙抛弃了东帝汶。在1975年，当最后一批将要去保卫巴图加德的葡萄牙旗帜的葡萄牙军官进入印度尼西亚领土前我向他们提过问题，回答是：

“你们帝汶人现在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办法恢复和平条件，因为你们帝汶人相互之间永远不会保持和平。这是传统。”

而这在部分是对的。我们被葡萄牙殖民主义分化瓦解，以杀害我们自己的兄弟，为葡萄牙涂金。其结果不仅是戏剧化的，而且也令人恐怖：我们不得不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新的保护国、我们自然的人类和生物组合或自我毁灭之间作出选择。

应葡萄牙于1975年11月1日和2日在罗马会议上的要求，印度尼西亚被迫建立和平与秩序。我们取代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四个党派选择了合并，因为知道在经过500年的情绪、痛苦、光荣和死亡之后，至少需要两代人才能最终实现繁荣与和平。

因此，唯一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将继续挑衅和冒

犯把我们从混乱和战乱中解救出来的印度尼西亚,还是我们应当在人类进步、尊严和发展所有领域中请印度尼西亚促进我们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共同特征的幸福未来?

在19年的放弃之后,葡萄牙成为一个受尊敬和光荣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行为是英勇的,尽管它有奉行过罪恶的进程,把其海外人民全面交给新的独裁者。但是,葡萄牙今天绝对不能帮助我们独立,因为我们已经独立了,我们决定请印度尼西亚保护我们,免除新的殖民主义形式,这种形式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分化和内战消灭我们。

除了北半球的富国之外,今天谁是真正独立的?东帝汶独立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分裂的,并且面临持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敌对;第二,除非我们把独立出卖给外国的剥削和统治,我们不能喂饱自己,因为我们的森林受到损害,60%的土壤不能迅速获得新的收获;以及第三,我们将被迫成为澳大利亚大门口的冲突国际化的地点和扰乱南亚大片地区的永久参照点,为太平洋两岸国家之间的新的密切关系制造困难。实际上,最后一点是某些军事领域中国际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摧毁主权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可能还有菲律宾的一部分。

我们努力争取西方文明在东南亚的合作和利益,主要重点是美利坚合众国,还有日本、中国、韩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使之能够给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带来直接和迅速的好处,第三世界有责任让西方和亚洲在和平中为了相互利益发展合作;否则的话,我们将无法阻止安哥拉、莫桑比克、索马里、比亚法拉、埃塞俄比亚等等地方的情况出现。国际秩序的基础现在不应当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而应是知识、人力、技术和为了伟大目标而进行的团结,例如生产粮食、机械、药物和更高的教育和生活水准。

印度尼西亚准备履行作为东南亚最大国家对人类需要的责任。如果说东帝汶对一些固执和顽固不化的团体来说是一个问题,这些人正是想要恢复腐烂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同一批人——而这毕竟是党对工人的专政——对我们而言,东帝汶正在稳步走向幸福,因为印度尼西亚中央当局现在完全致力于在所有领域尊重东帝汶人民。我们在过去建立并进行了并不是针对我们印度尼西亚兄弟的英勇抵抗。这种抵抗是针对虐待和暴力的,今天,这些凶手已完全遭到限制,并被印度尼西亚中央当局赶出东帝汶。

因此,我要请这一英明和尊敬的委员会允许葡萄牙和印

度尼西亚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的建议一道行动。显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这些历史进程的受害者和主角不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下坐下来会谈,东帝汶问题将继续成为联合国这个国际论坛的负担,它由于葡萄牙抛弃了东帝汶而继承了这些责任。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约翰·米勒先生(意大利声援东帝汶组织)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米勒先生发言。

米勒先生(以英语发言):建立于1991年的意大利声援东帝汶人民团体联盟是一个包括非政府组织、地方团体和从事支持东帝汶人民自决斗争的个人组成的联盟。联盟促进提供消息和提高觉悟运动和声援项目。

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东帝汶问题各有关的大会决议,并把他与类似的局势作一个比较,如纳米比亚、伯利兹或西撒哈拉局势,我们就可以指出如下,第一,这四个领土都曾经是殖民地,他们都有一个邻近强国,纳米比亚有南非,西撒哈拉有摩洛哥,伯利兹有危地马拉,东帝汶有印度尼西亚——这些强国都提出领土相连藉此而并吞的借口来企图征服他们;第二,在这四个问题上,联合国大会都已通过决议,承认自决权是实现彻底独立的一项手段;第三,其中两个国家伯利兹和纳米比亚,已经按照人民的愿望,实现独立。第四,在西撒哈拉,根据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所达成的协议,通向自治的轨道已经打开,联合国已经同意检查遵守停火的情况,并将确保资助一项全民表决,以便在没有军事或行政限制的情况下,给予西撒哈拉人民自决的权利。

铭记东帝汶境内继续践踏人权的状况,其中1991年11月12日发生在圣克鲁斯农场的大屠杀,仅仅是印度尼西亚占领军所犯下的众多暴行之一,意大利声援东帝汶人民团体联盟对个人组织和其他有关的人权观察员难以接触东帝汶表示严重关注,甚为关切印度尼西亚政府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压力不准声援团体国际会议1994年5月在马尼拉举行,还根据大会第三期/30号决议,要求联合国促进和保障东帝汶人民自决的权利,采取与纳米比亚、西撒哈拉和伯利兹同样的进程。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何塞·路易斯·古铁雷斯先生(革阵)在委员会议席就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古铁雷斯先生发言。

古铁雷斯先生(革阵)(以英语发言),东帝汶独立阵线,感谢有此机会在委员会上讨论东帝汶问题。我还要包括议员在内的感谢请愿者,包括议员,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国内支持东帝汶的情况,今天上午,我特别听了一位来自菲律宾的东帝汶网络声援东帝汶组织”的最新成员的发言,他是一个邻国的公民,这一邻国至少关心在他们邻近地区所发生的情况。

另外,很有趣地看到的是,我们第一次为东帝汶局势持相反意见不同的东帝汶人发言。我希望,下一次东帝汶境内印度尼西亚军方能让哈纳纳·古斯毛先生参加这一辩论,我还希望1991年11月12日,当青年学生和平示威为局势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遭印度尼西亚士兵杀害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东帝汶人出席这里的会议,这种作法也能在帝汶内施行,因为我们呼吁印度尼西亚当局至少听取人们的不同意见,如果我们能够开始简单的这么作,我们就能尽早解决东帝汶问题。

将近19年来,我们在没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提供任何物质或后勤支持的情况下,一直在抵抗对我们祖国的侵略和军事占领,而且克服了种种困难。1979年,在我们全国领导人90%在战场上牺牲或被监禁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把抵抗的大旗传给更年青的一代。

今年4月,我们完成了革阵国外分支重新组织过程,我们召开一次选举产生代表东帝汶境外成员的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成员。我们的目标是巩固帝汶革阵和社会组织以及帝汶人的团结,我们把一切政治分歧搁置一边,以便共同争取在东帝汶举行一次由联合国监督的全民表决和现在西撒哈拉进行的一样。人们必须承认摩洛哥桑国王接受西撒哈拉全民表决的勇气。为什么在东帝汶不这样作?

自从60年代以来本委员会一直讨论这一问题。葡萄牙1974年就承认自决权利,根据当年7月7日的一项葡萄牙法律,葡萄牙正式为独立前过渡时期设立了机制,但是,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中以穆普托将军为首的极端分子以及战略研究中心人员正在积极图谋东帝汶,策划政治和军事干涉。

自从帝汶问题开始起,革阵就多次呼吁东南亚国家组织(东盟)国家参与,以帮助公正的解决邻国中的问题。例如1975年9月,当印度尼西亚指责革阵侵犯印度尼西亚领土完整时,我们曾呼吁东盟成员派部队联合管制边境地区,但是,东

盟国家显然不顾这一小岛的困境。在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时,只有一个小国新加坡,对大会3485(XXX)号决议投弃权票。

今年,帝汶事业已经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但是,主要的成绩是在菲律宾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东帝汶问题会议。最近,非政府组织和人士和知识分子在雅加达成立东帝汶问题联合委员会,也是我们斗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印度尼西亚组织的一位代表亚山·皮加尔在马尼拉说:

“我们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原因是声援世界各地人民赢得正义与和平。我们的第一承诺献给正义:东帝汶人民应该有机会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只有这样,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之间才能有和平,已经造成许多人丧生的暴力才会停止。我们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不能不看到东帝汶是印度尼西亚境内争取民主和人权斗争的一部分。”

“为了人类,为了双方已经丧生的受害者,东帝汶境内的暴力压迫和威胁必须停止。丧失父母和亲人的儿童的哭声,在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与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另一位政治家,菲律宾参议员威格柏托·坦纳达在同一次会议上说:

“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一个人们较不注意的、与外界隔绝的民族,就我国而言,我们似乎得不到什么好处。我们应该关心他们,因为我们作为人的价值观是我们有义务不要剥夺他人的人性和他人的生存,当一个反对起码的人类尊严时,理当进行抗议,而计较这样的得失是不道德。无视非正义和压迫就是背叛我们的人性,就是不遵守人权,扭曲我们坚持善良与正义的良知。

印度尼西亚军队对东帝汶的入侵中断了我国的自然发展,经济造成混乱。在环境方面东帝汶遭受了广泛的森林砍伐,军事行动中使用脱叶剂,毁坏了我国的许多植被。印度尼西亚支持的很多公司剥夺了诸如檀香木等自然资源,均把燃烧树林作为对付游击队的措施。

关于健康状况,东帝汶的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一百六十。马里和东帝汶的婴儿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门的一位官员在1993年11月承认,5岁以下的东帝汶的儿童至少有百分70营养不良。巴考医院和印度尼西亚建立的其他医疗中心设备很差,医疗用品很少。

关于经济我们同意，东帝汶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和天然气是它最重要的资源，在东帝汶与澳大利亚之间有大量的储存。

这一巨大的储藏量吸引了日本和联合王国的多国公司。这些国家的12家公司现在已在那里作业。东帝汶的管理国葡萄牙曾在国际法院对印度尼西亚与东帝汶之间的帝汶峡谷联合开发条约提出质疑。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帝汶社区也在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质疑。

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那样，一个独立的东帝汶的政策是欢迎多国公司开发帝汶的自然资源。但在目前的阶段，我们不支持在帝汶海的任何活动。

在1975年，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和民盟的领导人应邀访问了帝汶海的一个近海平台。前总督利莫斯皮尔斯准将告诉我们，将在1977年出口石油。但东帝汶今天的情况如何？

从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学者、萨拉笛加大学的乔治·阿迪特约德罗教授最近作了结论，我们可以看出东帝汶的经济直接上由曾经带领军队侵略东帝汶的三位将军控制，莫达尼将军、达丁·卡布阿迪将军和塞哈拉·拉贾古库克将军。他们成立了PT巴拉·英德拉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帝汶经济，这个集团的分支机构垄断了东帝汶经济的每个部门：PT萨拉查控制了咖啡业，印度尼西亚PT香料垄断了檀香油产业，东帝汶PT马莫公司控制着大理石开采业。同时，另一个分支机构PT法图·贝西·拉亚把持着东帝汶大部分上木工程项目。

印度尼西亚在各种宣传材料所公布的数据中声称他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公司和就业机会，这也许是对的。但是，这些公司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将军们，并不属于东帝汶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主要给了印度尼西亚移民。例如国际新闻界最近报道，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与他们的在东帝汶的总督哈比利奥·索尔斯先生产生了分歧，如果雅加达政府坚持要任命一位非帝汶人士担任一个高级职务，那么他将辞职。

在我们看来，东帝汶的境况比以前更糟。至少在以前我们可以自由耕种我们的土地，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到我国任何地方去，并自由地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但今天的情况却不同。为此，我们来到了这里。

受印度尼西亚自己保护的人、东帝汶进步协会会长弗洛伦丁诺·萨门托克先生也对这种严重情况表示谴责。他也是印度尼西亚执政党专业集团的成员。今年4月，他对《华盛顿邮报》威廉·布兰尼金说，

“整个发展过程只是作给外界看的。”

谈谈乔治·阿迪特约教授得出的其他一些结论是很重要的，他说，在东帝汶印度尼西亚人把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桥梁和港口的修建集中在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而在其他较为太平的地区，例如埃尔默拉、马利安纳和从马利安纳到索海之间的地带，公路的状况很糟糕，几乎没有什么桥梁。

我不想细谈东帝汶的人权状况，因为我前面的发言者已经对此作了谴责，但我想谈谈与印度尼西亚驻东帝汶新任指挥官约翰·卢明棠上校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2月份，卢明棠上校指控东帝汶民族解放军杀死了一位村长。

就象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要指责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或印度尼西亚政府，或是漠视军方指称东帝汶人民解放军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曾建议，印度尼西亚政府、或联合国或其他国际人权组织一道努力，以查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人权作为一项普遍的原则捍卫，认为杀我们的反对派就是好事，这并不是我们的立场，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其他组织提出要求，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充分合作。

关于军事形势，印度尼西亚驻东帝汶指挥官卢明棠上校曾说，东帝汶民族解放力量只有大约200名游击队员，他们手中大约有100件武器，印度尼西亚士兵与游击队之间平均每个月交火一次。他还说自1993年9月以来，只有两名印度尼西亚士兵被打死。

不管我们人数多少，东帝汶民族解放军20年来在没有任何外来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抵抗，并将继续抵抗，直到能够找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为止。巴厘地区指挥官向外国记者所作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军队将减少到6个营的公开声明，受到抵抗运动的质疑。5月6日，我们指出了地点，并记录东帝汶总共有3万军队和治安部队。我的声明的全文含有许多这些营的名称：第112营、第114营、第389营。还有作战分遣队KOPASSUS第二集团军、DRINOB、KOBIM和警察部队。还有土著人组成的分队，如在包考的PIM SIERA、在QUELICAI的萨卡分队、维奎奎的姆基基特分队和洛斯阿尔法分队。印度尼西亚人时常宣布撤走一些营，但是，立即被其他营所取代。仅在帝力就有69个军事哨所，主要用来监视年青人。

我们强烈反对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任何军火，我们极为关切地看到欧洲和美国公司向雅加达出售军舰和战斗机。所

有这些现代装备将加强不仅在雅加达而且在东帝汶的军事实力。作为一个小岛和一个从来没有任何物质援助的国家,并且作为一个目标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捍卫其权利的国家,我们只能指望这些国家中爱好和平组织的声援以帮助停止这些销售。

最后,关于东帝汶政治局势,革阵领导人尼尼奥·桑塔纳说:

“东帝汶人民意识到极端主义者的僵硬态度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出于这一原因我们的斗争方法以温和、灵活为基础,以完全愿意进行对话为基础。然而,印度尼西亚政权仍然持蔑视、僵硬和傲慢的态度。我们仍然愿意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加入对话进程,以期探讨对所有有关各方有利的每一种可能解决的办法。”

在帝汶方面已达成一项全国协商一致意见。这一协商一致意见已于1989年2月由帝力的贝罗主教转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请求就东帝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5月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一轮会谈受到外交阵线协调委员会、一个由民盟、毛巴拉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革阵组成的协调机构的密切注视。最后公报中有一个积极的内容。第9段说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外长愿意同支持和反对合并的主要东帝汶人会晤。

帝汶外交阵线协调委员会已经宣布愿意会见阿拉塔斯外长。我们坚信,帝汶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手段和对话来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继续鼓励联合国秘书长履行其使命,以便加速不幸的东帝汶局势的解决。

请愿者退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发言。

费雷拉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英语发言)我再次在特别委员会上代表五个讲葡萄牙语的非洲国家--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我的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表示我们坚决支持东帝汶人民和那些为寻求一项可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直进行不懈努力的人。

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东帝汶局势仍然一样。印度尼西亚政府仍然不想给该领土人民一个机会以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获得自由的权利。

五个讲葡萄牙语的非洲国家集团要对政府占领军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对话必须继续下去,葡萄牙作为东帝汶非自治领土管理国必须受到鼓励继续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包括东帝汶人民的代表合作,以实现东帝汶问题公正的、全面的和得到国际社会接受的解决。

我们要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东帝汶犯人继续在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公正的待遇下受苦受难,这些犯人必须享有根据国际法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

最后,我们5国集团不支持以武力解决冲突的主张,并认为对话是必要的。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总有一天看到东帝汶人民的真正代表承担起对其领土命运的责任,理智的力量比镇压的力量更加强大。

工作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今天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委员会将在明天上午的会议上继续审议东帝汶问题。在结束该项目后,委员会将在两次会议上审议以下项目:小领土、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关于10个非自治领土的报告;西撒哈拉问题;1991年8月15日特别委员会关于波多黎各问题的决定;工作组的第101次报告;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军事活动和安排;新喀里多尼亚问题。

由于议程项目相当长,我请全体成员准时到会,以使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可得到的时间和会议设施。

下午6时15分散会